

一、神仙眷属

shenxian juanshu



水上情书：沈从文与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这个被时代分为文学家和文物专家的“乡下人”，一生喝过不同的苦酒和甜酒，看过各地的水云，他写下的情书和家书，带着岁月的沧桑和苦难，至今读来仍动人心弦。

（一）绝望孤独的爱

1929年夏天，沈从文被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破格聘为讲师，到上海任教。此前的沈从文行伍出身，在湘西看惯了杀人，厌倦了军队的生活，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到了北京，在寒冷、狭小的房间，饿着肚子，捂着被子，用手止着鼻血写作，从一个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人成长为一名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

在上海中国公学，沈从文遇到了他一生的爱人——张兆和。我们相信这是上帝安排的巧合，注定让沈从文的心灵先受到爱情的折磨和煎熬，然后才让他品尝幸福的甜酒。

1929年9月，过完暑假的学生们陆续回到了校园。这一天是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在此之前沈从文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所备资料足供一节课使用。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

特意花了八块钱，包了一辆黄包车，而此次讲课的报酬，却只有六块钱！

那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声名鹊起，当天慕名来听课的学生早挤满了教室。看着学生们期待的神情，本来准备好的开场白此时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请等我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

此时，整个教室已从议论纷纷变成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在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

他们中间，有一位外国语文学系刚上大二的女生来旁听，名叫张兆和，见沈从文如此狼狈，她竟不敢抬头再看这位年轻的老师。漫长的十分钟静静地过去了，沈从文终于抬起头来说道：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紧张得要哭了。后来沈从文回忆起初为教师的经历时说：“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好意和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哄下台去。”

在第一堂课上，我们无从得知沈从文是否注意到了张兆和。第一堂课沈从文的表现让张兆和觉得他不过是位只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年轻人而已，还不知道怎样讲课。随着沈从文的授课在学生中逐渐受到欢迎，张兆和旁听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这年冬天，沈从文对张兆和产生了恋情，这是典型的单相思。无法排遣，写起了情书。他的情书如同流水一样奔涌而去，为他的

爱寻找归宿。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也许是唯一而有效的打动女孩的方式。沈从文在《我喜欢你》一诗中写道：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战，身就沁汗
并不当到别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喊你的名字

沈从文爱上张兆和绝非“偶然”。从现在的黑白照片中可以看出张兆和的确是经典美女：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更重要的是张兆和的大家闺秀的气质——高雅、羞涩、内秀。张兆和出身苏州名门，张家四姐妹个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得美丽。张兆和在学校内追求者甚多，心性高傲的她把追求者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沈从文被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笑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那时的沈从文期待着这种幸福的降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惶惑而迷茫，一切都不可知。

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年青的张兆和却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一概不复。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

沈从文与张兆和是师生恋。周有光（张允和的丈夫）说，当时，经过五四洗礼，师生恋并没有受到来自道德或体制方面的反对。尽管如此，沈老师浓烈、持久的爱，给张兆和无形中带来心理压力，最

初，她是不认同这种爱的，希望在沉默中任其自生自灭。张兆和在日记中曾写道：“又接到一封署名S先生的来信，没头没脑，真叫人难受！”

写给张兆和雪花般飞出的情书，换来的是巨大的缄默。他也曾找过张兆和的同学王华莲通融、沟通，试图通过王华莲对张兆和进行劝说，说到动情处，沈从文曾流下了眼泪。但这一切努力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反而使张兆和对沈从文有了误解。

这孤独而绝望的爱情，巨大的挫败感一天天在心中蔓延，使沈从文无所适从。他想辞去中国公学的教职，以此逃避。他在给王际真的信中说：“常想一机会逃离此地方，出国无谋生本领，就到军队中去胡混数年。”

（二）爱情迎来转机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适校长的办公室，她拿着一大摞沈从文写给她的信，让胡适转交给沈从文。刚见面时，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沈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并说，我和你爸爸有乡谊，会和他讲一声的。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作声了，只是“为沈叹了一口气，说是社会上有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言外之意，怪张兆和不积极帮助沈从文这位天才。

追求无望，沈从文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了胡适，胡适写信安慰他：“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



1935年沈从文夫妇和他们不满周岁的长子，右一是九妹岳萌

错情了……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当然这种劝慰是起不到作用的。被爱情吸引的人，好比扑火的灯蛾，不知道是盲目冲动，还是追求美好和理想的爱情，让人有一种殉情牺牲的感觉。

1930年7月11日，张兆和收到沈从文当日写的第一封信：“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例外的称呼我‘兆和小姐’！”请注意当日的第一封信，沈从文有时一天中给张兆和写好几封信。而且，在信中曾暗示过张兆和，有可能走绝路。

7月12日，在收到一封六纸长函后，张兆和在当日的日记里写道：

看了他这信，
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摯的，
还是用文字装点的，
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

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

却深深地感动了我，
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
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
我总会记着，
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
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
他为了我，
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

一个女孩微妙、复杂的心思，仿佛微风拂过琴弦，发出微弱的一丝回应。尽管张兆和“很顽固地不爱他”，但她感动、珍惜他的爱。在这样的情形下，张兆和的心开始了松动，似乎默许了沈从文的追求。“‘蒲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蒲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任谁读到这样的情书片段也会心动的。沈从文的情书像流水一样，温润张兆和的心，需要的是时间，他相信她读到赤诚的情书慢慢也会有感觉的。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带着爱的文字始终会温暖人心的，心毕竟是情感到达的地方，不是冰冷的石头。美丽的情书，带着爱和哀愁，石头读后也会流泪的。或许，自从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第一封情书开始，在张兆和的潜意识里就有接受爱情的可能。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褻渎了你的。”

爱上一个人，才发现自己的卑微。沈从文的这段情书，让人想起

跌入爱河的张爱玲，张爱玲在赠送胡兰成的照片上写着：“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师生恋是经过千转百折的。张兆和的心情如乍暖还寒的早春，几经反复。当年7月15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他爱我爱得太深切了，他仍然没有放松他的想头，……唉，这真是一场孽债，那里是他的前因，将生怎样的后果，何日才能偿清！……知道他失恋后会有怎样的苦闷，知道……她实在是比什么人都知道得清楚，但是她不爱他，是谁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只能是上帝的设计，写下这一段话的张兆和，此时也是困惑的，犹豫的，她不知道，她一生的命运和牵挂都要托付追求她的这个人，她今后的道路将和这个人一起走过。

张兆和的这种困惑在于当一个人执著地爱着她，她实在是无从选择，她也没有力量和勇气拒绝，只好慢慢地接受了，何况很多人，包括她的一些老师，并不是摇头的，他们支持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感情，对于沈从文来说，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爱情的霞光即将来临。

大家都以为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经历放在了师生恋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沈从文的创作非常丰富，可能是爱情给他带来的动力。《从文自传》就是在此时出版。在中国公学，他尽其所能帮助学生，罗尔纲、吴春晗、何其芳等都得到过沈从文的支持和帮助。

（三）爱情修得正果

1930年8月17日，沈从文致信胡适“中公的课程我不想担任了，我过青大去”。但是，由于中原大战，交通受阻，沈从文去了武汉大学。1931年8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到杨振声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教《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两门课。

这一年的时间，沈从文四处奔波在路上，那个相貌清秀、肤色

微黑的女子的影子浮动在心里，挥之不去。到了美丽的青岛任教后，他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在这个海滨城市收获了他的爱情，青岛的山与海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1932年7月，张兆和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那年暑假，沈从文决定亲自来苏州看望张兆和，并向张家提亲。沈从文带了一大包礼物，全是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张兆和在《三姐夫沈二哥》里说到这件事：“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

沈从文带去的是什么书？笔者查阅多种资料发现，其中有《契诃夫小说选集》（后张兆和送给了汝龙，汝龙将《契诃夫小说选集》翻译成中文，上世纪50年代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27册汝龙中文译本），《猎人笔记》、《父与子》等，张兆和觉得礼物太重，只收下几种。

沈从文这次去苏州之前，先去了上海，还在上海认识了巴金，并由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当时，原《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请沈从文到一家俄国西餐菜社吃饭，同时请了巴金，二人相见谈得欢洽。饭后，沈从文约请巴金到他住处小坐，巴金又陪伴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把小说集《都市一妇人》书稿卖掉。因沈从文当晚要赶去苏州，两人在书局门口分手。沈从文约巴金到青岛玩，9月初，巴金到青岛住了一个星期。

到了苏州，沈从文去拜访张家，然而，张兆和不在家中，去了图书馆，沈从文留下了纸条，怅然而去。在去张家求访未果的情况下，沈从文回到了旅馆。正在思绪烦乱的时候，沈从文突然听到了两声轻轻的叩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正是他苦苦等待的张兆和。原来，沈从文从张家离开后不久，张兆和就回到了家。在二姐张允和的劝说下，张兆和来到了旅馆回访沈从文。

在苏州停留一周的时间里，沈从文每天一早就来到张家，直到

深夜才离开，在这期间，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长达三年的情书追求有了一个美满的结果。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成功，是因为张家并不反对，而且还有支持的。比如张家小五，沈从文感激他，在他出版的书中，写着送给张家小五。这次拜访，腼腆的沈从文没有当面向张兆和的父亲提亲。七天后，沈从文离开了苏州，返回青岛。沈从文写信给张允和，托她征询张兆和父亲对这桩婚事的意见。

张兆和的父亲思想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干涉。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也不持异议。

在得到父亲的明确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和一同来到了邮局，给沈从文发了一份电报。

周有光回忆道：“张允和呢就复他一个电报，就是允，允呢就是张允和的允，这一个字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表示是允许了，另外一个作用呢，允是她的名字，回复电报人的名字。所以实际上呢，就叫半个字的电报，姓名不算呢，只有半个字，半个字的电报也是很古怪的。”

半个字的电报发出去了，张兆和却仍不放心，她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就给沈从文发去了另一封电报：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

沈从文接到电报后，欣喜地找赵太侔（其夫人是俞珊），其时，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已经辞职，改名为山东大学，赵太侔任校长。为了成人之美，赵太侔请张兆和到图书馆工作。1932年秋天，张兆和到了山东大学，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在图书馆做馆员的还有李云鹤（江青），她旁听中文系的课程，也算作沈从文的学生。

沈从文在青岛时，精力充沛，爱情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再加上山海风景俱佳，适合居住。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教书之外的时间用来创作，写下了《凤子》、《三个女性》、《三三》等作品。三三，

是张兆和的排行。婚后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许多书信都称她为“三三”。《边城》中的翠翠，皮肤“黑黑”，《长河》中的天天是“黑而俏”，都取张兆和的肤色特点。沈从文和张兆和游览崂山北九水，看到一位洗衣服的美丽而朴素的女性，印象深刻，给他带来灵感，酝酿创作了《边城》。翠翠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有湘西女性的风情，也有崂山妇女的形象，还有张兆和的影子。

1933年7月，沈从文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应杨振声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工作。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张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张允和就叫她“媒婆”。

（四）家书中温柔爱意

“乍醒时，天才蒙蒙亮，猛然想着你，心便跳跃不止。我什么都能放心，就不放心路上不平靖，就只担心这个，因为你说的，那条道



沈从文夫妇与亲友

路不好走。”这是张兆和给她的沈二哥写的信，此时他的二哥漂流在小船上。

1937年1月7日，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在往返湘西的路上，事先约好了每天必写一两封信，沈从文把旅途上的“一切见闻巨细不遗全记下来”。沈从文靠这些家书创作出《湘行散记》。

三三，一切生存皆为了爱，必有所爱才能生存下去。

又有了橹歌，同滩水相应和，声音雍容典雅之至。我歇歇，看看水，再来告你。我担心墨水不够我今天应用，故我的信也好像得吝啬一些了。

《湘行散记》中晶莹透亮的文字，如同清澈的湘水一样，浸润着读者。在那些微微发黄的书页上读到这样的片段，心随着一叶扁舟，跌宕起伏。

这部《湘行散记》，本来就是写给三三（张兆和）一个人看的。如果没有这么爱恋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就不会诞生这本书的。

研究沈从文的专家张新颖写道：“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除了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沈从文还写了更多的内容，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私人性质的书简里，就显得非常自然。”

7月，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后，沈从文和北大、清华的一批教授离开北平。张兆和和儿子留在了北平，他们靠家书联系。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沈从文写下的家书数量非常大，经过战争、流离以及“文革”保留下来的家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这些家书不仅仅是个人的，它是那个时代的见证，渺小的个人和宏大的时代紧密相连。《从文家书》很感动人，张兆和说：“书出来以后，我们这一代的朋友，看了以后，都感动得不得了。李健吾夫人尤淑芬说她拿到这本书看到深夜，被迷住了。她说，我想你一定是带着眼泪写的，我也是带着眼泪看的。”

沈从文的命运和遭际感动了几代人，他写的家书敦厚、温柔的爱意也感动了几代人。那么，结婚前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哪里去了？最近读《沈从文年谱》，发现了沈从文情书的命运——毁于战火。1937年12月14日，张兆和致信沈从文，信中谈到张家苏州的房屋毁于炮火。“有两件东西毁了是叫我非常难过的。一是大大（张兆和之父张冀牖——著者注）的照片，一是婚前你给我的信札，包括第一封你亲手交给我的到住在北京公寓为止的全部，即所谓的情书也者，那些信是我俩生活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是将来数百年后人家研究你最好的史料，多美丽，多精彩，多凄凉，多丰富的情感生活记录，一下子全完了，全沦为灰烬！多么无可挽回的损失啊！”“为这些东西的毁去我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不可再得的，我们的青春，哀乐，统统在里面，不能第二次再来的！”

岳麓书社版的《沈从文别集》出版后，成为很多读书人的珍藏。有一位网友满怀深情地写道：上大学时，省吃俭用买下这套心爱的书籍，把它送给我爱着的一个女孩，现在书和女孩都在我的家中。这可以看作今人对沈从文与张兆和浪漫婚恋的回响。

现在传情达意的工具越来越多，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网络聊天，越来越快速、便捷，可是，我们的爱为何越来越苍白了？云中谁寄锦书来，那种漫长的等待和喜悦，已经成了历史了吗？

今天，读一读沈从文写下的情书，那里面有一代人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有一个时代的生动表情。苦难可以忽略不计，幸福可以永远回味。澄澈、纯净的湘水，哗，一下子流到我们身边。

最浪漫的事：周有光与张允和

“人世沧桑，岁月无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各种浩劫，那些折腾人的和被折腾的都已经离去，惟独张允和与周有光还恩爱如初，幸福得像一对初恋的情人。”有一篇文章，写周有光和张允和，如是说。

周有光晚年说起老伴：“张允和最聪明，可是她干的最蠢的事情就是嫁给了周有光。”这话里有话，说是“最蠢的事情”，其实，是两人一生“最浪漫的事”。回望两人的人生履历，一个世纪的历史烟云都成为背影，而他们的爱情，却有穿越岁月的力量，引起后人悠长的向往。

周有光早年学经济，以副业语言学而闻名，渐渐地，语言学家的名声盖过了经济学教授。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后来迁居苏州。1923年开始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同全体同学和华籍教授离校，改读离校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

张允和16岁时，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认识了周有光，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而张允和正读中学。随后，张允和进入中国公学读书。中国公学坐落在上海吴淞口炮台湾，是清末按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大学，于右任、王云五曾任中国公学的教师。自1928

年3月开始，胡适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11月28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全家搬至北平。

张允和读中国公学时，胡适任校长，女同学会主席正是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张允和的花季很有传奇色彩，1931年第一期《中学生》的封面刊登的就是她的玉照。

张允和容貌秀丽，身材娇小却风趣好动。周有光自从认识张允和后，无论在哪里见到她，他的目光都如同向日葵追随太阳一般，热烈地注视着她。年轻的周有光生性腼腆，常常找借口去看她，希望能够赢得她的芳心。张允和显然明白那目光的含义，总是躲着这个痴情的男孩，她从东宿舍藏到西宿舍，还吩咐管理员说张小姐不在。周有光每一次出击都没有得逞，只能失望而归，张允和因此在同学中间得了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

张允和80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就叫《温柔的防浪石堤》，写她和周有光的恋爱开始。

开头一段，凌空一笔：“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黄昏，不是清晨；倒是个一九二八年的星期天。”那时候，张允和刚刚19岁。

晚年张允和的文笔太妙了，请看能让人沉醉的诗意：

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吴淞江边的草地，早已没有露水。太阳还没有到海里躲藏，海鸥有情有义地在水面上飞翔。海浪不时轻柔地拍击着由江口伸入海中的防浪石堤。这石堤被年深日久的江水和海浪冲击得成了一条长长的乱石堆，但是还勉强地伸入海中……周围是那么宁静，天空是那么蔚蓝。只有突突的心跳、淡淡的脸红在支配宇宙……这一刻，天和海都似乎看不见了，只有石头既轻软又温柔。不是没有风，但是没有风；不是没有云，但是没有云。风云不在这两颗心上。一切都化为

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防浪石堤上，张允和与周有光，当她的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手交给了他，一生一世。

晚年周有光回忆起这一段浪漫的往事，那份含蓄和柔情，以及种种历历在目的细节，让言情小说家也自愧不如。周有光取出一方手帕，让他们相依而坐。他从怀中取出一本蓝皮的英文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把一枚漂亮的书签蓄意夹在其中。她翻开书签夹的那页，是恋人相见的一幕，“我愿在一吻中洗尽罪恶”一句赫然在目。这是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是罗密欧对朱丽叶说的。她脸红，心想这是个不怀好意的家伙。他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心出汗，他又掏出一条手帕塞进她的掌心。那天，张允和没有允许周有光“洗尽罪恶”，但两人的心已经连在了一起。

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书里还是担忧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十张纸的长信，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对于周有光，更令他鼓舞的是张允和的父母思想开放，支持他们的自由恋爱。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终于举行了婚礼。

抗战期间，张允和有时候和丈夫一起，有时候独自一人带着儿子小平和后来出生的女儿小禾逃难，从上海到芜湖、合肥，又到汉口、成都、重庆。有一次逃难，同船的还有曾国藩的孙女。在重庆，“大轰炸”过后，张允和亲眼看到了什么叫“肝脑涂地”。

战乱中的张允和再也不是张家的娇小姐。1941年5月，丈夫不在家，女儿小禾肚子疼，接着高烧不退，当时住在乡下，缺医少药，到第三天，还不好转，张允和想法子托人把女儿送进重庆的医院。两个月后，快满6岁的女儿小禾死了。